

另類「去殖民」的開始

從Tanayiku (達娜伊谷)的故事談起

斬新な「脱植民」の始まり—タナイク（達娜伊谷）の話より

The Beginning of an Alternative Way in Decolonization Take the Example of Tanayiku

若林正文 東京大學 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

因為我的專業是台灣研究，而且近20年來主要做的是台灣當代政治的研究與觀察。今天在這裡跟各位講一個故事。請各位先輕鬆一下。

2006年4月到6月我在台北教書。原來就對台灣的所謂「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基層社區重建的運動感到興趣，只是苦於沒機會去看看它的實際的例子。到台灣以後，有一個台灣學界的朋友推薦嘉義縣阿里山鄉的山美村。這位學者說：山美村是鄒族的山村，這裡的村民以全體村民的努力在自己的村子裡創造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觀光點，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觀光事業。在台北教書期間，我找到了替我帶路的台灣朋友，一位專門畫原住民題材的漫畫家和他的太太，我請他們帶路，六月下旬的一天跟他們一起到山美村去。

達娜伊谷與鮭魚

山美村的觀光事業叫做「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達娜伊谷是山美村境內一個山谷的名稱。達娜伊谷溪是台灣南部主要河流曾文溪上游的支流之一。達娜伊谷，鄒語的意思是「忘記憂愁的地方」。據說從前阿里山鄒族人看到山鹿在等待新的鹿角長出來的時候以及其他山裡的動物受傷的時候都聚集在這個山谷裡保養身體，就給它起了這個名字。傳統上，達娜伊谷溪有四個鄒族氏族分段擁有捕魚的權利以及管理河谷的義務。每個氏族捕魚時都適可而止，不會有濫捕的行為，也不會去越界侵犯到別的氏族的權利範圍。

達娜伊谷溪裡面的魚，有一種數量特別多，叫做鮭魚也叫做苦花，鄒語叫做「Yosku Aulu」，意思是「真正的魚」。達娜伊谷溪的自然生態在正常的時候，溪水裡充滿鮭魚，鮭魚群游的情景非常令人悅目。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曾經僱用漢族工人上山採伐木材，這些工人伐木工作完畢回鄉時，就順便搜刮一些山產，其中也包括河谷裡的魚類。聽說來到達娜伊谷的那一批工人是客家人。據當地人說這是達娜伊谷自然生態遭到破壞的頭一遭。

內部殖民

戰後，山美村鄒族部落的發展困境和其他原住民部落並沒有什麼兩樣。政府實行了地方自治跟普及教育，鄉裡的行政以及小學教育也初具規模，但是政府的山地政策，特別是山地保留地的政策卻在保護優先與開發優先之間搖擺，而最後屈就於開發的要求之下，平地資本的勢力與貨幣經濟的力量，1960年代以後，政府「山地平地化」的口號下，直接影響到了山地原住民的生活。越來越多保留地的土地權因為迂迴變通的方式流失。為了增加部落居民的收入，政府有時輔導山地部落種植茶樹、山葵等經濟作物，但茶葉、竹筍以及山葵等山產的銷路往往控制在漢族商人的手上，部落居民實際上的獲益並不多。山坡上過度種植經濟作物

等所謂超限的土地使用，導致了山地地表的脆弱化，一旦下起大雨，來就很容易發生災害，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原住民的部落。最近出版的原住民族土地問題的研究著作指出：山地農業上的土地使用效率先天上很難改善，跟平地的土地使用效益方面的相對差距也很難縮減。

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山地的原住民青年，甚至壯年人，或許是因為家裡需要現金，也或許因為都會生活的誘惑等，紛紛下山到平地謀求生路。正因為隨著這樣的變化，山地



▲ 2006年4月若林正文教授（前排左2者）到政大民族學系師生座談合影



原住民部落社會文化的根基便逐漸地流失或衰落。

下山到平地都會區的原住民，往往因為遭受到平地人的歧視或欺負，也因為自己缺乏在平地市場經濟的競爭力，只好從事那些很費體力的、很不乾淨的、也很危險的勞動，那些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平地漢人逐漸不想做的工作。有一位原住民學者形容他們工作在「最高的鷹架、最深的地底、最遠的海洋，最重的背負物以及最暗無天日的空間」。意思指的是都市土木建築的水泥工、釘板模、搬運等非技術或半技術性勞工、從事遠洋漁業的漁工、煤礦的礦工以及從娼的女性，那些女性甚至是少女。就這樣，聚積在都市社會下層的原住民越來越多，根據行政院內政部1992年的統計，有將近16%的原住民移住到都市裡去。但這只是正式在都市設有戶籍的人的統計而已，有些調查指出，如果包括在都市謀生而沒有設戶籍的人的話，這個數字將會攀升到25%左右。

台灣在1960、1970年代的經濟成長曾經

被稱讚為「台灣奇蹟」。其中一個理由是它實現了「growth with equity」，是一種伴隨著所得的均勻化的成長。但是，原住民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外。山地部落的經濟狀況很難改善，再加上，下山的原住民也多聚積在都市社會的底層，成為新的下層階級。而原住民與漢族之間的經濟總體差距也很難縮減。平均所得、失業率、平均壽命、單親家庭的比率、每單位人口當中的醫師人數以及嬰兒死亡率等指標，原住民和漢人的指標有相當的差距。台灣經濟發展的「growth with equity」的特質，表現在很多人想要當老闆，其中當然很多人失敗，但同時還是有一批數目可觀的人能夠成功的這個事實上。有人說這就是「Taiwan dream」。不過，原住民族似乎被排斥在這個「Taiwan dream」之外。

除了剛才提到的經濟的問題以外，一直到1980年代初，國民黨政府採行了一元化的文化教育政策，同時在部落年輕人出走的情況下，原住民各族母語面臨了比福佬話以及客家話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忽視原住民文

化的教材等等在原住民兒童心靈上有負面的影響，往往讓他們對自己有很深的自卑感。

我想，這種情形可以說是典型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情形。這種情形在威權統治時期是很少被注意到的。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的設立經緯

在這樣的內部殖民情況下，原先的四個氏族分段治理山谷的習慣被荒廢了，平地人，甚至自己族人以農藥毒魚及電魚的情形也已司空見慣，而警察取締也不怎麼認真。鄒族的「真正的魚」在達娜伊谷溪水裡快樂群游，引人入勝的情景早就不再看得到。

1980年阿里山公路通車以後，點燃了山美村民發展觀光事業的希望。山美村在1985年成立了觀光研究小組，研究出了二、三項利用達娜伊谷溪當作觀光景點的事業計劃。不過因為山美村自己缺乏資本，所以向政府請求支援，但是最終都沒有結果。

後來，當時擔任基督教長老教會山美教會宣道人的Pasuya Yatauyungana（高正勝）提出了依村民自己的努力創造出觀光景點的構

想，就是由村民組織巡邏保育隊把達娜伊谷溪封鎖一段時間，來保育河谷的自然並回復鱒魚群游的光景，希望能以此來吸引觀光客，也就是說，在達娜伊谷建立一個自然生態公園。Pasuya先生在年輕的時候當過遠洋漁船的漁業員，有一次到南非的時候，因機緣親自到過一個自然生態概念的公園。他決心推動這個構想之後，先去說服傳統上擁有分段使用達娜伊谷溪權利的四個氏族的長老。雖然分段管理的傳統習慣早已作廢，但是長老的同意對說服其他村民還是很重要的。

1989年10月山美村召開了村民大會，決議以村民集體力量進行「封谷護溪」來恢復、保育鱒魚，創立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之後他們訂定了村民公約，約束村民自己在封谷保育鱒魚期間不可在達娜伊谷取用任何資源。剛開始"封谷護溪"的工作並不是那麼的順利，先由Pasuya先生與他的家族帶頭進行，後來村內青少年響應之後才逐漸好轉，能夠成立幾個組的保育隊進行



巡邏護溪的行動。

「封谷護溪」的工作堅持了三年多，魚終於回來了。1993年成立了山美社區發展協會。1995年終於正式開辦了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觀光客。開辦當年公園營業收入只有51.6萬元，到了2001年公園營業收入達到了1855.7萬元，遊客總數23.9萬人，車輛總數1.68萬輛。以此收入為基礎，社區發展協會開展了老人、婦女、兒童的福利工作以及組織傳統舞蹈團、歌唱團、母語教學班等民族文化重建的工作。

一個「去殖民」故事：大故事與小故事

到目前為止，它是一個成功的故事，至於未來等待山美村民的到底是再一次的成功、飛躍、發展的故事，還是遭遇危機，甚至失敗、挫折的故事，或者現在想都想不到的異想天開的故事，我們還沒有辦法知道。

我對達娜伊谷的故事的解讀是：這個故事是台灣原住民族歷史的一個大故事裡面的小故事。我認為，台灣原住民族的大故事就

是他們的去殖民的故事，是他們在400多年的連續被殖民的歷史之後才剛剛開始的去殖民的故事。達娜伊谷的故事是在這個大故事裡面的一則小故事。

一般來講，談論台灣的「去殖民」的時候，談的是1895-1945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的去殖民。當然，日本對原住民族的統治也是近代日本的殖民主義的一部分，而且日本殖民國家就是第一個把原住民族所有的生活領域控制在它的統治之下的國家。1945年以後台灣「去殖民」的歷史很複雜，它對不同遭遇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會呈現不同的面貌，很難有一個很多人能夠一致的解讀。不過，對原住民族的處境，現在可以說有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原住民族被殖民的處境並沒有在戰後「中華民國」替代日本帝國而結束。削奪、縮減原住民族傳統治理的領域並以「文明」或「現代化」之名義從外面強加部落社會文化變遷，其始作俑者當然是日本，但在戰後「中華民國」的統治並沒有阻止或逆轉這個趨勢，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之下，

土地及文化的流失可以說更為嚴重了。

根據台灣最近出土的現代史史料，戰後初期在日本走了，新的統治者還沒鞏固他們的控制的過渡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菁英曾經表明過原住民族要恢復傳統領域以及原住民族自治的願望。北部復興鄉泰雅族領袖Losin Watan（林瑞昌），向官府提出了一個用日文寫的陳情書。他開頭說：他們「台灣族是台灣的原住民族，往昔居住在平地之事，由歷史觀之至為明顯」。然後他提出控訴說：「脫離日本統治之桎梏，回歸自由平等之身，台灣光復，被日本追趕至後山的我們，也應該復歸祖墳之地，慰祭祖靈，實在理所當然。既已光復，我們也要沐浴光復故鄉之喜悅，相信此乃明白之理，否則，光復於祖國之喜何在。」。

另外，鄒族的菁英，當時被任命為吳鳳鄉，現在的阿里山鄉的鄉長Uongu Yatauyungana（高一生），呼籲原住民族各族領袖，聚集在南投縣霧社開會討論原住民族的未來事宜。他所發出的用日文寫的「案內狀」，就是開會的邀請書，附上了一則「附記」。這則「附記」當中，Uongu Yatawuyungana提出了自治的構想，他說：「我們

如此悲慘的命運所驅迫。幸好，此刻民主主義已經成為台灣的方針，依循民主的精神，為了高山全體民眾的幸福，我們高山族要一致團結，以和平交涉的方式，設定高山族是真正主人翁的區域。」

後因Losin Watan和Uongu Yatauyungana接觸過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在所謂的「白色恐怖」當中，在1952年被捕，54年都被槍斃。但是，這些「出土史料」歷歷證明了，台灣原住民族菁英有過明確的原住民族的認同，曾經的確點燃過他們要恢復故地、追求民族自治的夢。這些「還我土地」與「自治」的要求應該是台灣原住民族在接觸現代性國家之後(很不幸地它是一個殖民國家)第一次提出的「去殖民」的行動。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的構想在Pasuya先生等山美村領導人士的心裡發酵的時候，下山到都市的原住民族各族青年的菁英分子，以台北為主要舞台已經開始了原住民族運動。狹義地來講，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指的是1983年到1995或96年以這些泛原住民菁英發起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為核心，以街頭示威當作主要訴求的方式，來抗議台灣戰後內部殖民



舊事新知

結構製造出來的種種不公義現象的一種社會運動。原權會在1984年底成立，88年3月發出了一個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上很重要的歷史性的文獻，就是「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我想，我們在這裡不需要去逐條解讀它的內容，但是我想要指出：這裡他們再明確不過的指出他們作為台灣島上「第一民族」的認同、驕傲和危機感，並列舉了作為「第一民族」應該擁有的權利。我想這是他們繼戰後初期的前輩之後，再一次點燃了「還我土地」與「自治」的夢，也是台灣原住民族去殖民大故事的很明確的劇本。

到目前為止，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說小，但也不能說很大。除卻污名化爭取「正名」的運動算是成功了。原運要求的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族的稱呼寫進了憲法以及原住民有關的法律裡面，也成為社會上「政治正確」的稱呼。在政府的中央層次設立主管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的要求也實現了，1996年12月行政院成立了原住民委員會（簡稱原民會）。有了原民會，原住民除了透過原住民立法委員之外，也可以透過原民會得到相關的政策資源。

但是，其他方面則沒那麼理想。在法制方面，原運本來想要爭取把原住民族的土地權、自治權以及發展權寫進憲法裡去，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發展權寫進了憲法。山地的土地問題本來就很棘手；族自治的制度設計也有很多問題，原住民族各族內部要取得共識，聽說是困難重重的，更別說是改動現行的地方自治制度，讓漢族的主流社會接受此一重大制度的變革。另外，更進一步地把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以及自治權寫進憲法的工作，前景也不是很樂觀。因此，最近有一位原住民菁英很感慨的向我指出：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其實剛剛開始而已。

雖然是剛剛開始而已，跟戰後初期的他們的前輩比較起來，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大故事大聲講起來了。那麼，為什麼達娜伊谷的故事是這個大故事裡面的一個小故事呢？有兩點因素：

第一：雖然是小規模，但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的事業成功地逆轉內部殖民在部落跟平地之間做出來的人流。一反過去部落年輕人出走的現象，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做

出來的人流是平地人上山到原住民經營的觀光景點來花錢的。前面提到的達娜伊谷公園經營主體山美社區發展協會是以全體村民為會員，能夠把經營公園的收入用到部落的社會文化重建以及部落福利的一個制度機制。經營公園這個事業本身留住一些部落青年不下山的作用。如果經營主體是平地資本的話，平地人到達娜伊谷花錢也不會產生這個作用。這個可以算是有了一層反內部殖民的意義的現象。

第二：在致力於創建並維持達娜伊谷公園的部落領導人士的身上，能夠看到他們作為「第一民族」的驕傲。我跟漫畫家朋友夫婦一起到山美村的時候，很幸運的見到了Pasuya先生。他介紹在達娜伊谷「封谷護溪」行動當中發生的一個小插曲。這個部分與「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開頭的部分對比起來，這兩個表現出來的都是自己是台灣「第一民族」的認知與驕傲。

最近幾年的台灣政治社會的紛紛攘攘，特別是這幾個月紛紛擾擾，對長期關注台灣民主的人來講，雖然是一個外國人，還是難免感到一點沮喪的。民主和自由在台灣到底做到了什麼？

這一類的疑問不由得在內心裡油然而生。

在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了最近知道的達娜伊谷的小故事，也想到了台灣原住民族運動這個台灣原住民族「去殖民」的大故事。這個大故事，以及達娜伊谷的小故事，如果沒有民主跟自由，不太可能發酵、萌芽、發展。這就是民主、自由在台灣確實做到的事情之一吧。

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就這樣給原住民族去殖民的事業提供了一個環境，但反過來思考，原住民族運動也提供給台灣社會一個多元文化、族群共生的社會想像。而且，台灣社會在被庸俗化的族群政治困擾之餘，在摸索如何落實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 **multi-culturalism** 理念的時候，原住民族是天生的、最好的執行者，同時也是一個監督者。

學術聊天也是聊天，聊天本來就沒有什麼結論的。我的話就到此為止。謝謝。

本文係作者在東京大學「近現代中國與東亞的公共性國際研討會」（2006年10月15日）所發表的專題演講稿，原題為「另類『去殖民』的開始：在臺灣，民主·自由能做什麼？- 從阿里山鄉山美 (Savigi) 村·達娜伊谷(Tanayiku)的故事談起」。內容為作者以漢語撰稿，本刊校訂後刊登。